

《素食者》中的空间规训、流动性与伦理书写 Disciplinary Space, Mobility, and Ethical Writing in *The Vegetarian*

修涓译 (Xiu Juanyi)

内容摘要: 本文聚焦韩江《素食者》，论证主人公悲剧遵循空间收缩—流动性剥夺—伦理选择极端化的逻辑。英慧先后经历家庭空间的父权暴力规训、画室空间的审美客体化、以及精神病院的终极禁锢，其物理流动性逐层受限，迫使其伦理选择不断走向极端。本文揭示了现代权力结构的深层悖论：权力试图通过压缩空间与剥夺流动性来规训异议者，却适得其反，迫使主体在物理禁锢的极致下，通过成为植物这一反叛式伦理选择，实现精神的极致流动并逃离现有秩序。

关键词: 《素食者》；韩江；流动性；伦理选择；空间规训

作者简介: 修涓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Title: Disciplinary Space, Mobility, and Ethical Writing in *The Vegetarian*

Abstract: Focusing o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tagonist's tragedy follows the logic of spatial contraction—deprivation of mobility—radicalization of ethical choice. Yeong-hye successively experiences patriarchal disciplinary violence in the domestic space, aesthetic objectification in the studio space, and ultimate confinement in the psychiatric hospital, during which her physical mobility is progressively restricted, forcing her ethical choice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extreme. The article reveals a profound paradox within modern power structures: power attempts to discipline dissenters by compressing space and depriving them of mobility, yet it proves counterproductive. Under the extremity of physical confinement, the subject achieves radical spiritual mobility and escapes the existing order through the rebellious ethical choice of becoming a plant.

Keywords: *The Vegetarian*; Han Kang; mobility; ethical choice; disciplinary space

Author: Xiu Juany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midoriko0000@163.com).

当代知名韩国作家韩江（Kang Han），曾于2016年以《素食者》（*The Vegetarian*）斩获布克奖，并于2024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充满了对东亚社会以及女性普遍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正如她自己所言“我相信这是因为我的小说直接探讨了人类的苦难。我没有回避，而是尝试更深入的探究”（克里斯·李 154），其文字既是记录也是反抗。《素食者》作为其代表作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其中主人公英慧成为植物的设想更是为变形题材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一分色彩，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新的反叛符号。

目前，学界研究已涉及父权压迫¹、身体政治²及创伤体验³等议题，多聚焦于英慧肉身的在场与反抗，较少系统性地从空间批评视角出发，将小说中的家庭、画室与医院视为一个连续的权力运作过程。由于空间不仅是叙事的背景容器，更是参与权力生成的关键因素，本文拟从空间视角切入，探讨小说如何通过主人公英慧在家庭、画室与医院三个空间的流动，揭示现代权力规训与个体伦理选择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转换实际上映照了文本中伦理结形成伦理线的动态过程⁴，空间的每一次流动变化都伴随着伦理冲突的升级。以此补充现有研究在探究其伦理选择生成机制上的视角缺失。本文将重点考察：现代权力如何依托空间秩序，通过逐级压缩个体的物理生存空间并剥夺其流动性，进而惩罚并消解伦理异议。在这种极致的物理禁锢下，成为植物这一具有极强反叛性的伦理选择，并非单纯生活方式的突变，更是主人公对人类本质的重新思考，伦理选择活动是“人在获取人的本质的过程”（聂珍钊 17）。由此本文也重新审视英慧在面对暴力吞噬的社会结构秩序时，如何通过这种反叛式的伦理选择，试图反思并重构人之为人的本质。

一、家庭空间与流动性的受限

在韩江的《素食者》中，主人公英慧反叛传统的伦理选择与主体性悲剧，皆始于家庭这一空间。“家庭居住空间，在内部，生产着家庭的伦理关系；在外部，则再生产着社会关系”（汪民安 156），小说所描绘的家庭空间并非天然的庇护所，而是一个由伦理规范构建的权力场域。“家庭是交替着褫夺权力、虐待和实现的位址”（麦道威尔 100）它不仅被动反映父权秩序，更在日常运作中主动生产着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英慧在这一空间中作出的素食

1 参见 Kim Won-Chung, "Eating and Suffering i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5 (2019): 9.

2 参见 Nie Zhixing and Hardev Kaur, "Transcending Constraints: Female Bodily Discipline and Resistance i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Asiatic: IIUM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2025): 48-63.

3 参见 邵薇：“再现生命的脆弱：《素食者》中的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2025）：96-102。

4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选择,对既有的父权秩序构成了正面挑战。随之而来的权力压制,使得英慧的物理流动性骤减,且其社会身份亦陷入单一固化状态。

家庭空间的伦理秩序,内化于日常生活的角落,通过成员间的互动与身体实践被不断生产。在英慧的家庭空间中,伦理秩序的具体呈现是维护基于年龄与性别的等级秩序,最高准则是平凡与顺从。丈夫选择与她结婚的理由“是在默默执行韩国社会对‘平凡女性’‘平凡妻子’的潜在规定”(董晨 107)。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韩江 2)。这种对平凡的推崇,本身就是对个体特殊性的压制,也是该家庭空间中伦理压迫的委婉呈现。这实质上在整个外部社会以及家庭内部建立起一套隐形的规训机制,任何违反这种规训的特殊性都被判定为对既定空间秩序和其中权力核心的威胁。无论是在父亲还是丈夫的权力视阈中,英慧本是作为一种静默、透明的背景存在,而素食行为这一反叛的选择则赋予了其主体一种具有可见性,这种异质性使家庭空间原有的父权秩序发生震荡,也自然引来权力的压制。

英慧坚持素食的伦理选择既违背了顺从的原则,又在整个韩国社会中显得极不平凡,也因此发生在家庭聚餐上的伦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家庭空间内,作为绝对权威中心的父亲,其食肉的饮食偏好是整个家庭的规范。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认为肉食文化是父权制话语的象征,它不仅是食物,更是象征力量、男性气概及对自然世界支配的文化图腾。¹“学界普遍将素食主义理论化为一种赋权模式,用以抵抗父权制”(Ahn 277)。因此,当英慧宣布“爸,我不吃肉!”(韩江 37)时,她不仅是改变个人饮食习惯,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了餐厅这一空间中的权力核心。“在韩国社会,社会顺从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美德之一,因此这种偏离(指素食)是很难被接受的”(Kim 3)。故而除父亲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也无法共情理解英慧,除了姐姐外的其他人反而默许了父亲将英慧逼至自杀。更进一步来说,家庭成员共同的饮食规范是该空间中权力所主导的伦理秩序的具象化呈现,也成为一种确认彼此身份,巩固家庭伦理秩序的仪式。因此英慧选择素食,被视为对家庭的背叛,因为它打破了以食物为媒介的秩序呈现,使得家庭空间中原有秩序瞬间崩塌。

同样,家庭中的卧室作为夫妻关系的私密空间,也展现着鲜明的权力关系。英慧的身体在此空间中,首先是被丈夫视为作为妻子的工具性存在。选择素食后,在性事中英慧表现出彻底的疏离,丈夫感到被侵犯的不是情感,而是他所认为的,作为丈夫在家庭空间中应享有的权力。正如麦道威尔(Linda McDowell)指出,性欲特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身体及其快感共同交织在权力关系之中。在异性恋语境下,“这组权力关系中,最寻常的就是男人定义并控制女人的性欲特质”(55)。英慧通过身体的拒绝合作,单方面宣告

1 参见 Carol J. Adams,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了卧室空间原有伦理功能的失效，将自己的身体从妻子的社会符号中抽离，从而在象征意义上叛离了这个被夫权欲望所定义的空间。

英慧的叛离迎来了家庭空间对英慧的规训，这首先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压缩和对其身体和社会身份流动性的剥夺。在第一阶段的家庭空间中，英慧的身体流动性以遵循妻子和女儿的伦理规范为前提。然而，她以素食发起的伦理反抗直接挑战了这一秩序，“重新获得对其身体的能动性（agency）和控制权至关重要地联系在一起。她对肉的拒绝象征着她对暴力的政治拒绝，并涉及对基于男性的普遍暴力结构的社会文化规范的身体和性能动性的维护”（Ahn 277）。然而家庭空间原有的伦理规范随即启动了以剥夺其流动性为核心的惩罚机制。惩罚首先表现为直接的物理暴力。丈夫的性强迫和父亲的强行灌食，均是父权逻辑试图以暴力否定其身体自主权、强行压迫其伦理异议的实践。

当暴力因英慧的自杀行为而失效后，惩罚策略便从直接暴力转向了空间隔离。她的伦理反抗被权力迅速烙印上不正常的标签，并以此为由被驱逐出原有的家庭空间，而隔离在出租屋进行监控。这种隔离构成了对其物理空间的首次压缩。英慧的身体流动性因此被急剧剥夺——从一个尚有一定自由的家庭主妇，降格为被监视在狭小空间内的病人。这清晰地表明，其身体流动性的丧失，是她发起伦理反抗后遭受的直接惩罚，是权力压缩空间以消除异议的开端。

其次是身份流动性的固化。在家庭空间中，家庭伦理结构决定了英慧的身份是平凡的妻子，是温顺的女儿，并且其社会价值以及是否被家庭空间接受的依据，也几乎来源于在这两个身份上她根据相应伦理规范所践行的程度。当英慧反叛现有的秩序规范，从平凡变得有特点，从顺从变得有主见，家庭空间便无法接受这种变化带来的对现有结构的冲击，而只能将其行为理解为对家庭的背叛和精神上的失常，并排斥于家庭空间外。丈夫反复斥责她没有做到作为妻子的责任，家人则指责她的行为给家庭蒙羞，并强行灌食。家庭利用正常与反常的二元对立，将英慧的伦理选择污名化为精神疾病，由此剥夺她社会身份的合法性。英慧因此丧失了在家关系网络甚至社会网络中身份正常流动的资格，即作为妻子、女儿、妹妹、社会一员，成为一个被孤立排挤的个体。

面对家庭空间中原有的伦理规范，英慧的素食行为是一种反叛式的伦理选择，也是一场以身体为战场的抵抗。家庭空间以其强大的权力压迫，证明了现行伦理秩序的牢固。在家庭这个充满悖论的起点，英慧以身体的重创为代价，完成了她的第一次伦理选择，然而，自杀未遂的结局标志着她在第一阶段相对温和的伦理选择的失败。同时，自杀这一激进的行为，也预示了更进一步的伦理选择的酝酿。

二、画室空间与流动性的降格

在小说中，流动性的降格不仅指主体流动范围的缩小，更意味着英慧

从具有主动性的主体向被动的、静止的客体转变。如果说家庭空间是通过食物链的隐喻，将英慧推向植物化的边缘，完成了对她各方面流动性的初步束缚，那么画室空间则构建了一个更为精密和隐蔽的规训场域。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Lefebvre 54）。空间的转换，带来了其中伦理逻辑的置换。在此过程中，英慧作为主体的流动性进一步降低，所身处并能流动的空间也更加狭小，仅剩出租屋与狭小的画室。在此情境下，英慧的伦理选择呈现出由外在对抗向内在转化的趋势，她不再仅仅停留在对食肉逻辑的直接拒绝，而是通过接受在身体上描画植物，开启了形式上成为植物的初步尝试。这种选择标志着成为植物的念头已在悄然萌发，并试图寻求一种非人类逻辑的生存可能。

画室，作为一个看似超越世俗、追求纯粹审美的场域，实际是福柯意义上一个典型的规训空间。“空间不是思维的客体，空间并不以客体的方式存在于意识之外，对于人来说，空间的特征是在人类行为中显现出来”（冯雷 104）。因此画室空间的伦理表征可以理解为是从画家本人行为模式中具象而来的，在小说中该画室空间内作为画家的姐夫其核心行为便是凝视。不同于餐桌上那种直白、粗暴的权力注视，画室中的凝视被赋予了所谓的艺术合法性。此外，“凝视指的是‘话语决断’是社会建构而成的观看或‘审视方式’”（约翰·厄里 2）。姐夫不仅是凝视的主体，更掌握了这个空间的核心权力。他利用艺术话语的霸权，重新定义了空间内的伦理坐标，使得原本在家庭伦理中乱伦的禁忌，在这里被重新定义为艺术创作的合理性。

然而，这层艺术的合法性外衣，恰恰成为了姐夫投射其个人欲望的掩护。从文学伦理学角度看，姐夫这一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斯芬克斯因子中自然意志、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结合¹。他假借艺术至上的自由意志，将潜藏在灵魂深处、受利比多驱动的自然意志合法化。这种意志的交织与错位，将家庭伦理中被严厉禁止的欲望，即对小姨子的情欲凝视，合法地转化为了审美审视，构成了画室空间内独特的伦理冲突。画室这一独特的空间伦理即艺术高于一切，暂时压倒了家庭伦理，从而为他正当地压迫并占有英慧的身体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所谓专业外衣的掩护下，权力关系被更深地内化，因为在这个空间中英慧“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福柯，《规训与惩罚》225）。她的身体在其中被彻底地客体化与物化。她不再是家庭伦理秩序中的妻妹，一个具有复杂社会身份和内在情感的主体，而是沦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媒介，一个由光影、线条、色彩和构图所组成的视觉对象，成为画室空间下的被压迫物。正如福柯所述“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福柯，《规训与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惩罚》226)。英慧最终成为姐夫个人艺术与情色欲望的投射对象。

在画室这个空间内，其中的伦理逻辑已然变化，画笔取代了餐具，画布成为了新的祭台。而艺术创作的全过程，本质上是姐夫利用这一空间所赋予的权力，通过凝视将英慧物化以满足其欲望的过程。这种凝视是单向的、不容置疑的，“凝视是一场表演，它会替这个世界安排先后顺序、塑造模样、划分类别，而非如实映照”（约翰·厄里 2）。画家是凝视的主体与权力的拥有者，而模特则是被凝视的客体与被支配者。

在画室空间的伦理秩序下，英慧的流动性遭受了更为严重的降级。首先，在身体维度上，她从一个尚能做出拒绝姿态的人，彻底沦为一具被摆布的静物。“对个人而言，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停地监视和规训。在一个封闭空间内部的监视和规训，可以将个体锻造成为一个新的主体形式”（汪民安 104）。这种隐秘的权力机制所依赖的正是在该空间的伦理架构。画家与模特的伦理身份成为姐夫侵占英慧身体理所当然的途径。在画室空间里，英慧的身体被要求摆出各种姿势，以满足姐夫创作的需求。她没有行动自主权，也不能言语，甚至不能有自己的表情，这种静物化是对其生命能动性的极致剥夺。然而，悖论在于，正是这种物理身体能动性的极致剥夺，迫使英慧的主体性转向了唯一可能的场域——精神与想象。她的身体越是静止，她的精神流动就越是奔向植物这一自由形态，这在文本中呈现为她主动接受了姐夫人体模特的邀请。

其次，在社会维度上，她的身份被彻底悬空。在进入画室的那一刻，英慧这一承载着她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和家庭角色的名字被暂时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功能性的标签——模特。这个标签将她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抽离，使其成为一个孤立的、去社会化的存在。她既是艺术的媒介，又是欲望的对象，两种身份的叠加，让她的人格尊严与社会属性消弭于无形，彻底沦为服务于他者创造与欲望的纯粹客体。

如果说，英慧在家庭空间的选择，是她对原有伦理压迫的第一次反抗，那么，同意姐夫在自己身体上画满花朵，则是她的第二次、也是更深层次、更具反叛性的伦理选择。她开始思考，是否能够通过将自己植物化，完成一种存在的转换：从一个被欲望、被暴力、被压迫的肉体，转化为一个仅供观赏、不被压制、也不带来冲的审美对象。这是一种绝望的自我拯救，她试图用一种不伤害他人的存在形式，去逃离那个充满暴力和掠夺的现实世界。英慧的选择本身是对人类存在形态的追问：如果社会结构中的人注定要活在一种暴力循环之中，难道只有放弃人的本质才能脱离这个循环重获生命的平静吗？这样的追问，在英慧进入精神病院后成为了她留给读者的难题。

三、医疗空间与伦理选择

精神病院标志着现代权力规训的终极场域，它在物理空间的绝对压缩中，促使主体的伦理选择走向了最终一步——成为植物。在这里，英慧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了极致，从家庭的生活空间，到画室的狭小场域，最终缩小为一间病房，乃至一张病床。这种空间的演变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更是权力压迫的加深：如果说家庭和画室尚有生活或创作的余地，精神病院则是一个完全被剥离了社会属性、旨在实现彻底控制的终极场域。在这个空间里，伦理压迫不再需要通过情感爆发（如父亲的愤怒）或欲望伪装（如姐夫的艺术）来运作，而是披上了医学理性这件不容置疑的白袍。这白袍象征着一种客观、冷静且具有合法性的强制力量。“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病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福柯，《疯癫与文明》252）。在这一空间逻辑下，英慧的所有反抗，包括对肉食的拒绝、对衣物的排斥、坚持倒立，已经不仅是伦理的反叛，转而被统一贴上了精神疾病的标签。规训的目的不再是教化，而是通过定义英慧为无理性的疯子，来彻底否认其伦理异议的合法性。因此，精神病院不仅是英慧流动性彻底被抹灭的空间，更是其主体性在遭受极致压迫后，将前一阶段成为植物的想法尝试转化为行动实践的最后场域。在此，她的伦理选择完成了从拒绝暴力、尝试成为植物到彻底抛弃人类存在形态的递进式变化。

在精神病院空间中，英慧的多维度流动性被系统性地剥夺至极限，最终彻底消失。首先，是身体流动性的彻底终结。进入精神病院后，英慧的身体不再是家庭伦理的争夺对象，也非艺术欲望的审美客体，而是沦为一个纯粹的临床标本。她身体的自主支配权被完全剥夺。强制喂食这一在家庭空间中充满暴力与情感冲突的行为，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冷静、程序化的医疗手段，即“通过静脉注射供应蛋白质和葡萄糖”（韩江 153）。这种看似人道的非人化操作，比其父亲粗暴的干涉更具毁灭性，因为它以拯救生命的名义，彻底否定了英慧以拒绝食物来捍卫身体边界的最后权力。她的身体被输液管、监视器和病床所束缚，其一切行为都不再被视为一种主观意志的表达，而被客观地记录为需要分析与控制的临床症状。在此，身体的能动性被彻底悬置，它不再流动，只是一个被维持生命体征的被动容器。这种身体的静止化标志着肉体逃逸可能性的彻底抹灭。

其次，是社会身份流动性的完全抹除。在家庭中，她是妻子和女儿；在画室里，她是模特。这些身份标签虽然充满了压迫，但尚且维系着她与社会网络的一丝联系。然而，英慧有悖于公认的社会伦理的行为让她最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分隔、净化、划分界限和惩罚逾越行为等理念，它们主要的功能是在本质为混乱的经验之上强加一套体系”（Douglas 4）。在精神病院

的逻辑体系中，英慧成为了病人，而这一终极标签取代并覆盖了她所有的社会身份。这个身份将她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彻底剥离，使其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去社会化的孤岛。就连作为她与外界最后纽带的姐姐，也必须通过医生和护士的转达来理解她的状态，她们之间的沟通被一套冰冷的医疗话语所中介。英慧不再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她的存在价值仅在于作为医疗系统的干预对象。社会意义上的她已经死亡，被彻底地驱逐到了正常社会秩序的边界之外。

然而，正是在这片象征着现代权力极致规训的空间中，在她被剥夺了一切物理与社会身份的绝对禁锢中，英慧完成了她终极伦理选择——成为植物。这构成了全书最深刻的悖论：那个旨在通过暴力惩罚、空间隔离、强制喂食、药物治疗将她拉回人类世界的系统，恰恰通过剥夺她作为人的一切外部属性，为她彻底挣脱人的身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英慧在病房里尝试倒立，这一动作在空间意涵上具有颠覆性：人类的直立是为了在社会空间中行走、索取和消耗。而英慧的倒立则是为了扎根，是为了否定人类的生物逻辑，转而追求植物般的、不需要伤害他者的生存方。然而这样的行为却是并不被现有秩序接受，当英慧最终被救护车从山上带走，发出那声“禽兽一样的嘶吼”（韩江 176）时，那是她作为人类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拒绝。从此以后，她便沉入了植物的静默。她的身体虽然被禁锢在病床之上，动弹不得，但她的精神却实现了终极的流动。她以彻底放弃人类存在的方式，摆脱了人类现有的伦理压迫，换取了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

因此，精神病院这个规训的终点，吊诡地成为了她解放的起点。社会的现有伦理规范试图纠正她的伦理异议，最终却反向成全了她的伦理选择。英慧通过主动放弃流动成为植物来对抗人类社会对她实行的强迫静止，通过放弃人的属性来重构存在的意义。

她的悲剧在于，为了抵抗一个吞噬性的、充满暴力压迫的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她必须以放弃人类本质身份为代价。成为植物的英慧，既是现有伦理秩序胜利的标志，因为它成功地将一个异议者从社会中彻底清除。同时，它也是主体反抗不屈的证明，因为它以一种权力无法理解、无法消灭的方式，实现了永恒的存在。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英慧在家庭、画室与精神病院的空间轨迹，揭示出空间收缩——流动性剥夺——伦理选择极端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三个场域构成了一个递进的规训链条：家庭空间依托父权伦理实施公然暴力；画室空间凭借审美凝视进行隐蔽客体化；精神病院则借医学理性达成终极禁锢。在这种空间的逐级压缩下，个体的物理与社会流动性趋于归零。

然而，空间的极致紧缩催生了英慧成为植物这一决绝的伦理选择，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统一。在物理与社会维度上，英慧失去了对身体和身份的控

制，沦为被驱逐的边缘主体。但在伦理维度上，这却是一场深刻的抵抗。这种以彻底的不动来实现终极流动的悖论，反映了她试图从根本上跳出那个以人为中心的、充满掠夺与压迫的伦理秩序。她以一种沉默的、非人类的在场，实现了精神上向着自然、阳光和大地奔涌的极端流动。因此，她的失败恰恰是她抵抗得以完成的终极形式。而这之所以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是因为它也揭示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在现有伦理秩序下，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规训压迫，人似乎只能选择自毁的形式，才能从本源上拯救自己。

韩江通过英慧成为植物的伦理选择，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主体在不合理的伦理秩序和结构性压迫下的反抗和突围，这种叙事超越了特定的性别、种族与东亚文化背景，触及了关于权力、身体与自由的普遍性命题。它不仅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情，更是对现代性社会中那些冷静、理性且人道的规训逻辑深刻的反思。英慧的沉默与倒立，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现代文明中那些隐匿在日常空间之下的、被制度化的暴力。它迫使读者去反思那些现有的现代社会中冷静、理性且人道的规训逻辑和伦理体系。

Works Cited

- Adams, Carol J.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 Ahn, Hakyong.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Sexual Dynamics i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43 (2024): 277-293.
- 董晨：“韩国女性主义文学热中的‘东亚女性’——以《素食者》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2025）：104-114。
- [Dong Chen. "The 'East Asian Woman' in the Boom of South Korean Feminist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Vegetarian*."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2 (2025): 104-114.]
- Douglas, Mary.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 [Feng Lei. *Understanding Space: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ceptions of Spac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8.]
- 韩江：《素食者》，胡椒简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
- [Han, Kang. *The Vegetarian*, translated by Hu Jiaotong.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1.]
-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 [—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Kim, Won-Chung. "Eating and Suffering i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5 (2019): 1-10.

克里斯·李：“暴力与人之为人：和韩江的对话”，胡俊译，《世界文学》2（2025）：150-157。

[Lee, Chris. "Violence and Being Human: A Conversation with Han Kang." Translated by Hu Jun. *World Literature* 2 (2025): 150-157.]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徐苔玲、王志弘译。中国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McDowell, Linda.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translated by Xu Tailing and Wang Chihhung. Chinese Taipei: Chuen-Hsueh Publishing Co., Ltd., 2002.]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6-25。

[Nie Zhenzhao.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Choi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16-25.]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约翰·厄里、乔纳斯·拉森：《游客的凝视》，黄宛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Urry, John and Jonas Larsen. *The Tourist Gaze* 3.0., translated by Huang Wany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Wang Min'an. *Body, Space and Postmoderni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